

学兼四

李先生是淹贯博通的大家,学兼四部,贯通古今。今天我们忝为所谓“教授”,因无童子功而又受到分科教育的影响,已不能与李先生和业师萧蓬父先生那一代人相比。

李先生的学术特点是博通。他兼修文史哲,既善于哲学思辨,又饱含诗情画意。李老“沿着文史哲不分家的老例,用苏轼所写诗词作为研究的素材,提交某大会一篇论文的题目是《兼综儒道佛、契合情理神》”。透过诗词来探讨思想,这是很有难度的。此文讨论苏轼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在我看来也是先生自己生活的写照。

李先生提倡“博而后约,杂中求专”,而他自己则是身体力行这一主张。李先生的历史研究论文深具哲学思考与分析的功力,而他的哲学研究论文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和很强的历史感。只有李先生才有资格为陶潜、海瑞作评传,因为这需要文史哲兼通的底子。他还著文讨论张九龄、屈大均、龚自珍的思想,如前所述,以诗证史,以诗讨论思想,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李先生还善于从杂书中,从明清笔记小说中发掘思想史的材料,对于民间草根的东西十分重视,这正是我们哲学系出身的人所不具备的。这恰好是我们今天提倡国学教育的目的之一。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举凡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大家,李先生都有专文讨论,特别是儒释道诸家,尤其是孔子、老子、孟子、庄子、柳宗元、宗密、朱子、陈白沙、湛甘泉、李卓吾、王夫之、戴震等人。他对《老子想尔注》与《六祖慧能都有著作》,他的讨论也涉及法、名等诸子百家。李先生堂虎甚广,不拘于文化思想史中,解读文献,创造诠释,游刃有余。

限于篇幅,我把李先生的学术贡献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李先生深刻揭示了中国哲学思想史及其代表人物的内在矛盾,发掘其内在的思想逻辑,探索发展的内在在理路及社会历史效应两重性。例如李先生有关儒家思想的大量论文,有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对儒家宗师与儒家社会历史的作用,有鞭辟入里的分析。“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李先生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李先生肯定先秦、宋明儒学的精义,又分析其理论的内在紧张,尤其是理欲观、义利观的张力,既看到儒学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不同作用,又昭示其在今日与今后的价值、意义及两难处境,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第二,可贵文化自觉。愈到晚年,李先生愈益坚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的当代意义。李先生强调“时代性与民族性从矛盾中得到统一”的历史辩证法。在传统与现代、时代性与民族性、东方与西方的张力中,李先生自觉地剥离出中华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据与精华,特别是作为族群认同、伦理共识与终极关怀之基础的中华人文精神、核心价值。李先生高度评价了儒学在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干的地位。他说,“多元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何以能贯通各家,我认为与儒家开创者孔子思想的包容性有一定关系’,因而特别弘扬孔子的文化包容意识。

李先生又特别看重孟子的重民思想、救世精神与独立人格,肯定其“制民之产”“保民而王”的仁政学说,其独立人格、浩然正气和大丈夫精神在今天的道德伦理重建中仍具有道德资源的价值。

李先生有关传统思想与现代

佛性是空还是有? 灵山似幻亦非真。”并在其《思空斋诗草》中自注道:“世事当如是观尔。”他经常说自己的人生哲学是“道法自然”。我想,这种“法自然”“无我”的哲学,并不是世俗所谓的“消极”。恰恰相反,透过这种现象上的反应,我们看到了一个哲人的超越。这种超越,不仅是对个人荣辱、毁誉、穷通的超越,而且是对自我存在的超越。由这种超越精神的引导和提升,李锦全先生真正达到了自我身心的和谐,自我与社会的和谐,自我与他人的和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所在,生活连篇。

李锦全先生十分注意教书育人,悉心培养青年一代,甘为人梯。他充分肯定青年人的思想开阔,勇于创新;但同时也严肃指出其知识面窄,史料功底和理论功底都有所欠缺的弱点。但他坚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衷心祝愿并真诚鼓励下一代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他培养的研究生,基本上都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并成长为上所在单位的骨干。其中,有的学有所成,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担任了教授、博士生导师,有两位成长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有的担任了省部级学术机构的领导,有的在海外深造。看到后辈的成长,他感到由衷的欣慰。

李锦全先生欣赏这样一副对联: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似天上云卷云舒。他在萧蓬父教授《佛教哲学简介》的题词中云:“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因缘莫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他儒学史观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色。对于民国初年以康有为、陈焕章为代表并得到袁世凯、张勋支持的立孔教为国教运动,他持坚决的否定态度,认为这种试图通过儒学的宗教化在现代中国恢复儒学统治地位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其所以如此,如从儒学史来考察,就在于儒学的哲理化而不是儒学的宗教化,才是儒学形态与功能演变的基本走向和总体趋势。在他看来,儒学有着通过自我修养、提升道德来调整人际关系的丰富内容,这些内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其启发性 and 生命力,可以加以现代转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内容,为建构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儒学在今天的长处与价值,不是在“新外王”,而是在“内圣”。展望未来,儒学只有帮助人们提升道德内涵和思想素质,才能适应和平发展的新要求,也才能给自己的发展带来新希望。总之,他认为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前途,不在于建立儒教或复兴儒学,而在于吸取儒学中仍然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内容,做出适合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李锦全先生的儒学史观,是他坚持独立思考的心得、长期探索历程的结晶,不仅在20世纪中国儒学史研究中卓然成一家之言,而且对21世纪中国儒学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性。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又不敢反抗,以虚化的认识安顿自我,以一种全然的空无之境解决自己的现实困顿。苏轼则强调“断后缘”和“乐天知命”,与陶渊明思想归趣一致。而道士葛洪则兼采儒道,走向了另一个入世思想维度,这为失意者以退为进,取得进身之阶提供了思路,出世人世各取所需,钟鼎山林的矛盾取向实现了有效二元互补。

总之,李先生的道家研究,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揭示了道家发展的二元路向,确立了道家文化“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的内涵意义,厘清了道家文化的迁延脉络,多视角全面解读了道家文化的生命力所在。通过架构道家之“文”与“化”的学脉逻辑,呈现了道家区别于儒家、墨家和法家的发生历程,从学术上描述了道家在历史上的融通状况,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道法自然

止于至善

李宗桂

《李锦全文集》既是李锦全先生60多年学术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的一个侧影。从这套文集中,我们可以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体会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酸甜苦辣,感悟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风范。

李锦全先生是史学专业出身,毕业于当年名家荟萃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用碑刻资料对照历史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即用唐碑证史,研究结果写成《跋》文。他完成的《唐代碑刻目录(附跋文)》,受到指导老师岑仲勉和刘节两位史学大家的肯定,给予高分。他是考古学界“黄埔四期”中第一期的学员,接受过考古学大家宿白、裴文中等先生教泽的滋养。1953年,他曾经参加出土有战国竹简的长沙仰天湖汉墓发掘,并曾赋诗感慨“仰天湖上出奇珍,竹简千秋尚未闻”。20世纪50年代,他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思想史,1960年跟随中国思想史教研室转到哲学系,继而转研中国哲学史。他参加过老一辈学者主编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写作,后又与同辈学者共同主编过教育部统编教材的工作。因此,无论在实践操作层面还是理论思考层面,他对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关系的研究都颇具权威,令人信服。

在学术研究领域,李锦全先生

不以专家自居,而常以杂家“自嘲”。就历史阶段而言,从先秦两汉到宋元明清再到现代,他的研究都有涉及。就学术思潮和流派而言,儒道墨法名佛诸家,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新学、近现代哲学、当代新儒学,他都有研究成果。宏观的探讨,微观的剖析,史的溯源,论的探研,他都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

李锦全先生治学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但又不乏鲜明的个人特点,这就是从兴趣出发的率性而为。当学界一窝蜂倾心于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作传的时候,他研究采菊东篱下而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研究刚直不阿敢骂皇帝的海瑞,出版了《陶渊明评传》和《海瑞评传》。这不仅是为思想文化史研究补缺,而且是要张扬道家的自然和儒家的刚健,更是人生价值观念我手写我心的体现。当学界都在热衷于儒道互补之论的时候,他发表了《论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儒法互补问题》一文,提出传统文化中不仅有修身方面的儒道互补,更有治国理政方面的儒法互补。

李锦全先生为人沉稳厚重,淡泊名利。他做事讲究实际,不务虚名。他做研究,始终坚持学术真理,在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同时,不越时守旧,论从己出。对于学术界的前沿问题,他既积极参与,又保持价值理性。他说话写字,平实自然,决不敢弄玄虚,更不为了炒作而制造耸人听闻的歪论怪论。他提出,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矛盾融合,承传创新”;儒家的仁学本质上是一种人际关系学;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进程中,不仅有儒道互补,还有儒法互补;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史上,魏晋玄学的出现和宋明理学的出现,推进了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哲理化进程;儒学是一种吸取了宗教哲理的思想,具有宗教的特点和功能,但儒学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宗教;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关键在于要用现代化的理念去扬弃、转化传统哲学的合理因素。诸如此类的见解,反映出李锦全先生尊重历史、崇尚学术真理的品质。这与近些年来某些为了出名牟利而不息炮制各种歪论怪论、以走极端而博关注的入相比,其境界和立场极不啻天壤之别! 历代正直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这种人格境界和精神风范,在李锦全先生身上得到了传承。

李锦全教授为人谦和,心胸开阔,善于与人合作共事。他与陈玉森教授、吴照钊教授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学术合作。他们的真诚合作精神和友好相处的态度始终如一,体现了团结向上的精神面貌。他们彼此尊重,和衷共济,其乐融融。他们从来没有

时的时代环境中,既肯定其中的合理性,又批判其中的局限性,而不主张对孔子做一边倒的非历史主义评价。他又指出,随着儒学在后世的进一步开展,这种二重性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被放大,这一点在宋明时期尤其突出。宋明时期儒学的哲理化,既使儒学适应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又放大了儒学的二重性,不仅带来了侈谈心性义理,忽视国计民生的空疏学风,而且将封建纲常哲理化,造成了社会上人际关系的紧张,以致出现了“以理杀人”的历史悲剧。因此,他认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对宋明道学的批判,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持积极肯定态度。但同时,他又指出这种新思想仍然属于儒学思想的自我调整,呈现出儒学异端的味道,对于儒学思想传统是有所摆脱而没有完全摆脱,因而同样体现了儒学的二重性品格。

面对在现代中国如何重估儒学的价值、如何更新儒学的形态与功能,如何对儒学作出现代化转化等问题,以及近百年来由此所引发的种种探讨和论争,李锦全先生都力求从历史主义出发,表明自己的态度,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些思考构成了

卓然一家的儒学史观

论思维水平的确经历了一次飞跃。有人认理学出现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这话有道理;但儒家与佛、道合流并不是趋于宗教化,而是吸取其哲学思辨性的一面,排斥其宗教神秘性的一面,从而提高到哲理化的高度。这是他对儒学历史走向的基本理解与评价,成为他儒学史观的重要思想。

重视儒学历史发展中的包容性,是李锦全先生儒学史观的一个基本点。对于儒学的包容性,他用“矛盾融合,承传创新”八个字来加以概括和表达,认为这一特点在儒学史史上长期存在,表现为不同的方式。例如,在先秦思想开展中,儒、道、墨、法四大流派都存在着矛盾斗争的一面,但同时也表现出互相渗透和逐渐合流的趋势。在孔子开创儒学时,其思想即蕴含较大的包容性;而荀子的思想创造,则更集中体现了兼综诸子百家的精神。荀子之所以能够在孔孟之后对儒学的开展作出特殊的贡献,这种包容性是一个重要因素。又如,董仲舒作为汉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者,对儒学在先秦之后的开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董仲舒的思想,并非纯粹

的儒学,而是“儒表法里”的儒法思想互补。再如,在儒学与佛教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融合,承传创新”。这不仅表现为佛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世俗化和儒学化的趋向;而且还表现为儒学以其包容性,对佛教思想做了积极的吸取和改造,柳宗元就是一个“亦儒亦佛”即儒释兼综的人物。不仅如此,这种包容性还存在于儒学内部。对于儒学内部的不同派别与思想,如对于宋代儒学中的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两派,既存在着合理的积极的内容,又存在着不足的负面的东西。孔子一方面在人格道德上主张人人平等,强调正己正人、立己立人、已达己达人,另一方面又在社会政治上表现出对传统等级秩序的维护,要求人们各安其位、各守其分、不能犯上作乱,这就形成了儒学在人际关系上二重性的思想矛盾。因此,他主张把孔子的思想放到当

曲原意的个别现象,但作为人生终极关怀,在总体精神上还是和道家合拍的。二是语境上可附会。老子所创立的神通广大的“道”,有神秘色彩;他还思想的复归,属于先秦道家的正统。何晏、王弼开创了“正始玄风”,他们“祖述老庄”,发展了老子的本源论,与郭象一样是调和名教与自然。

李先生认为,道家与道教有文化先缘性。一是二者学理上可贯通。老庄用天道自然代替神创世界,但他们的世界观是归根复命、任天安命。而《老子想尔注》将“道”解释为宇宙和人世间的主宰,虽然释教有牵强附会或增字解经甚至歪

深度思考的道家文化观

曹智频

李锦全先生的道家文化研究包括道家哲学的发展路向考察、道家走向宗教的文化“先缘”探讨和道家文化批判及乐天知命生命观的历史影响三个方面。

李先生认为,道家哲学包括政治哲学和本体论问题。其中,老子的无为而治“无所不宜”。其“务为治”思想,通过与儒、墨、法等多元融通,建构了正宗传统文化的理论框架,培育了传统思想方式。黄老学派是其代表,它综合各家所长,但思想基调还是道家。老子以静制动、以退为进和后天制人的思想策略,表明他反抗却不作战;其以柔克刚可以在全球化时代迎接挑战,寻

求机遇,抗击霸权。

在本体论层面,玄学围绕名教与自然关系展开。嵇康提出“名教违反‘自然’”,是“以道非儒”的老庄思想的复归,属于先秦道家的正统。何晏、王弼开创了“正始玄风”,他们“祖述老庄”,发展了老子的本源论,与郭象一样是调和名教与自然。

李先生认为,道家文化批判和乐天知命的生命表达影响深远。在原始道家思想中,历代不满现实的隐者和避世之士所从事的文化创造和思想批判,形成了异端独特的道家文化传统。先生认为,过去对庄子追求洁身自好精神生活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如陶渊明从自然的变化和表现来理解生命自然存在和生态自然发育。他既不同流合污,

國學

本报教育部 主办
2019年第4期 总第532期